

古钢琴是欧洲 14 至 18 世纪的乐器。古钢琴有两种：一种是击弦古钢琴，又被译为科拉维科德，另一种则是拨弦古钢琴，又被译为哈普西科德，它们都是现代钢琴的前身。除外形略有区别外，与现代钢琴相比，古钢琴发出的声音没有延音，音质不够饱满厚实，比较沉闷黯淡。

一、古钢琴传入我国的时代

古钢琴何时进入我国，一直众说纷纭，大多数说法集中在元代和明代这两个时期，认为古钢琴是在元代进入我国的依据是《元史》149 卷。根据这一卷《元史·郭宝玉传附郭侃传》的记载，郭宝玉是郭子仪的后裔，成吉思汗手下大将，郭侃则是郭宝玉的孙子，曾随蒙古的旭烈兀西征，攻打到西戎，也就是现在的巴格达时，灭亡了阿巴斯王朝，得到的战利品中有一件七十二弦琵琶，就是这短短的一句“得七十二弦琵琶”，引来后人无尽的猜想。因为后世，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献给明神宗的礼物中就有古钢琴，而在对古钢琴的描述中，有一句便是“弦七十二”，认为郭侃所得这件七十二弦琵琶便是古钢琴的说法也是由此而来。不过，灭阿巴斯王朝是 1257 年左右，而目前已知的，关于古钢琴最早的记载是在 14 世纪的欧洲，1257 年时欧洲没有古钢琴，巴格达也不可能有古钢琴，从时间上看古钢琴是不会在 14 世纪之前传入我国的，所以，现在大多数的人看法更倾向于当时的这件七十二弦琵琶，也许是另一种维吾尔族的乐器——卡龙^[1]。

除此之外，关于古钢琴传入我国的资料中，最早的来自于《利玛窦日记》的原件，这是本主要记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内容的日记，中间多次记载了一些关于他将古钢琴传入我国的文字，其中还明显提到他传入中国的古钢琴是科拉维科德。而我国关于这件事的最早的记载来自于清乾隆十

二年官修，纪昀校订的史书《续文献通考》。在该书的第 120 卷第五页中，记载了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前往北京朝见当时的明朝皇帝神宗朱翊钧时所献的一件该国乐器，据记载这件乐器纵三尺横五尺藏棹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链铁为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又见到弦七十二，而在《续文献通考》中，古钢琴也被称之为七十二弦琴，这就能理解为何会有人认为 1257 年郭侃从巴格达带回的便是古钢琴了。不同的是，从诸多的文献资料对这件乐器的形态描述上和时代上来看，利玛窦所献给明神宗的确实是一架古钢琴。另外，在 1601 年明代王临享撰写的《粤剑编》中也有类似键盘乐器的描述，但具体这种乐器是古钢琴或是管风琴一直存在争议，也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考证。因此，从目前已经明确真实性的资料来推断，古钢琴是在 16 世纪末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传入我国的。

二、古钢琴传入我国的途径

利玛窦是意大利天主教会传教士，1583 年，即明万历十一年，利玛窦与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罗明坚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尝试，并在中国多地传教之后，利玛窦全权负责了中国的传教活动。为了争取在中国传教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他开始策划到北京去朝见当时的中国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并准备了许多送给明神宗的礼物。经过几番曲折，1601 年 1 月，即明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等人终于见到了明神宗，并进呈上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等礼物，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大西洋琴，即古钢琴。这次朝见使利玛窦等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并下旨允许他们在北京长住，从此，北京便成了中国内地天主教最具有影响力的教会中心。虽然利玛窦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教，而古钢琴只不过是达到了这一目的而献上的一件礼物，然而毕竟利玛窦为古钢琴传入中国这方面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这架进贡的古钢琴除了在进京途中就曾引起无数国人的好奇心之外，在进入宫廷后，也曾引起过明神宗的强烈兴趣。据记载，明神宗曾经派四名在宫廷中演奏乐器的太监，向另一与利玛窦同时来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则学习弹古钢琴，而四名太监也各自学会了一首古钢琴曲的演奏，而利玛窦则用古汉语写下八首歌词，并以中文命名为《西琴曲意》^[2]。

然而这台古钢琴在刚进贡时的风光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明神宗冷落了，当它再次出现在视野中时，已经是 1640 年，即明

崇祯十三年。据记载，1640 年，当时非常受崇祯皇帝宠爱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在进宫安置日晷时，无意中发现了当年利玛窦进贡的那台古钢琴，并为崇祯皇帝弹奏了一曲。虽然当时此琴已经损坏破旧、年久失修，但崇祯皇帝还是很满意，并命汤若望重新修理这架钢琴，而且要求再制作一架新钢琴。同样是为了传教目的来到中国的汤若望对修复旧琴和制作新琴的工作非常尽心尽力，虽然新琴的制作因为工艺和材料上的困难没有能够完成，但在不久后，旧琴的修复工作便顺利完成。而汤若望还专门撰写过一本中文钢琴教材来介绍古钢琴的结构建造和演奏方法，可惜此书后来失传，而这台曾经受到两代帝王宠爱的钢琴，由于时局动荡，历史变迁，最终也不知去向了。

三、古钢琴在中国的发展史

古钢琴在中国的发展，几乎都与皇帝和天主教脱不了关系，可以将其当成西洋乐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代表，甚至可以看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1656 年，即顺治十三年，曾有荷兰使臣献古钢琴一架。到了康熙年间，康熙帝受到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的影响，非常热爱西方的科学，学习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对西方的乐理乐器也相当有造诣，由此西洋乐器越来越多地传入宫廷。康熙帝任用了一批精通音乐的传教士，教授古钢琴的演奏和乐理知识，不仅自己学习，还命令后妃、皇子及其他皇室成员学习。康熙十八年，康熙帝召见了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弹奏古钢琴，并命他弹奏一首中国乐曲。徐日升的演奏令康熙帝大悦，之后常与之倾谈乐理，与之学习弹古钢琴，甚至能在古钢琴上弹奏中国的古琴曲《普庵咒》。而当时的传教士们还能够，在宫内自己制造各种各样的西洋乐器，有资料称，善于制造西洋乐器的法国传教士南光国便曾为康熙帝制造过科拉维科德。虽然在这一时期，康熙对古钢琴的态度，使得古钢琴成为清初宫中盛极一时的乐器，而且在民间也能够见到古钢琴的影子，但这些西洋乐器主要在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堂出现，而在民间并不普及，在中国整体发展不十分深入，因此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并不大。而到康熙晚年时，由于东西方礼仪之争，围绕着中国教徒是否能够敬天、祀祖、祭孔，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发生了严重冲突。康熙三十二年，当时的教廷完全摒弃了以前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尊重不同文化传统的指令，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这对于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深刻的中国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康熙



龟是一种古老的物种,它作为一个物种,进化是缓慢的,但它代表的寓意在中国古代却变化不小。这其中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

原始时代的人类,每个部落都有一个动物或无生物作为其部落的名称,这个动物或无生物就是这个部落的图腾。在最初大概是因为某一群团或部落以这种动物为其食物的主要来源,而被其他群团或部落给它加上的一种标志,如食蛇部落便被称为蛇图腾,食“三青鸟”的部落,便被称为“三青鸟”图腾,食龟的部落,便被称为龟图腾,等等。后来,部落正式以外人替它加上的名称为其部落的名称的时候,他们便渐渐禁止食用作为本图腾名称的动物,但对其他部落的吃食,是不加干涉的。从而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作为他们图腾名称的那种动物转变过来的。这样,图腾便成了一种不可侵犯的具有维系部落成员的魔力了^[1]。有几种动物在中国民族的意识中,直到现在还寄予不少的神秘性。第一就是龟。“龟”对于商族,是具有一种神秘化的权威的东西。他们不仅把它看成“神龟”、“圣龟”,并以之来“龟卜”一切吉凶。国家大事,都一一听它取决,一若“龟”是具有查往知来,明悉巨细,有左右一切自然界、社会界的权威的东西。到周初,像在《洪范》中所说明的情形,合国王、臣僚、民众的力量,都不能超过它——还不能不为它所左右。如《洪范》中的一段记录:“汝则有太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视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从这一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龟在人们意识中的神秘性。“龟”或者就是商族所采用的图腾标志^[2]。由于这个图腾部落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一个强大的商族,所以从原始时代遗留给他们的龟的神秘性,也就随着成了他们政



治上的工具,并传播到其他民族中去——特别影响到其继起者周族统治者——便构成了后来中国人对于龟的普遍的迷信观念。

龟的寿命长,既能在陆地,也能在水中生活。活动空间大,阅历长,是长寿的象征。龟是古代四灵(龙、凤、麟、龟)之一。《礼记·礼运》云:“何谓四灵,麟凤龙龟,谓之四灵。”《述异记》载:“龟,千年生毛,寿五千岁谓之神龟,寿一万年曰灵龟。”《抱朴子·论仙》载:“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寿焉。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洛书》曰:“灵龟者黜文五色神灵之精也,能见存之明于吉凶。”《洪范·五行》曰:“龟之言久也,千岁而灵,此禽兽而知吉凶者也。”《淮南子》:“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久岁矣。”而且,“四灵”中只有龟在自然界中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古人认为龟是人与天神之间联系的中介,通过它可以领会神的意志,尊崇龟可以获得神的保佑。因此,龟在中国古代早些时候是作为一种灵异、长寿的象征加以崇拜的。龟又和贵的发音一样,所以这乌龟不仅象征“寿”,还代表“贵”。在过去的年画里,把乌龟、仙鹤、梅花鹿画在一起,就叫做“三寿图”,把蝙蝠(富)和乌龟(贵)画在一起,就表示“大富大

贵”的意思。中国古代还有一种习俗,新姑爷第一次进门的时候,要送给老丈人一个金龟,表示希望岳父老人长寿,于是有人就夸有钱有地位的姑爷为“金龟婿”。还有,古代人物的名字中,也常常含有龟字,取其长寿富贵之意,如唐代大音乐家李龟年、大文豪陆龟蒙等。

此外,传说龙生九子,龙王的第八个儿子,名为“螭”,又名霸下,样子似龟,喜欢负重。龟驮碑的传说与明朝的开国大臣刘伯温有关。相传刘伯温建北京城的时候,曾经降伏了龙王的九个龙子,给他们分派了任务,让他们各司其职。这龙王的第八个儿子被刘伯温派去驮石碑了,于是“龙八王驮石碑”传来传去就传成了“王八驮石碑了”。

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时期,发展成了理学。理学倡导的纲常伦理就是“忠孝节悌礼义廉耻”这八个字。文人善用曲笔,如果说这个人“无耻”,并不直接说,而说此人“忘八”,意思是这个人忘了那第八个字了。第八个字不就是“耻”嘛。于是,“忘八”在口耳相传的过程里以讹传讹,逐渐变成了“王八”了。不知道来龙去脉的又把这个“王八”和那个驮碑的“王八”连在了一起,于是这“乌龟”和“王八”就成了“无耻”的形象代言人了,从此乌龟就彻底蒙受了不白之冤。

由此可见,乌龟最初的寓意来源于它的本身特点。因为它的古老和神秘性,被人们视为图腾加以崇拜。后来又作为传达神意的媒介,比如龟筮。又因为它的寿命较长,又被人们作为吉祥的象征。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想象力也不断增加,竟然把一个正面形象的乌龟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演义成了一个受人羞辱的无耻的反面形象。并且,在演义过程中,都带有当时的价值观。所有的一切,乌龟是无辜的,都是人类给它改变的。可见,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

参考文献

- [1]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 ★作者简介:向福贞,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副教授。

帝对此事表现出极大的耐性,多次与教皇交涉,而在多次沟通解释无果后康熙帝最终大怒,终于下令闭关锁教,这一政策成为了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被此后清朝历代皇帝继承,对清王朝乃至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随着这一国策的执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陷入低谷,虽然乾隆时期西洋乐器仍然发展到一个相对鼎盛时期,但到

了嘉庆年间,这位不喜欢西洋音乐及乐器的皇帝作出了更为严格的禁教,作为西洋乐器代表的古钢琴,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就此中断。而西洋乐器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但此时古钢琴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康熙帝听徐日升弹奏钢琴是在1679年,那时,巴洛克音乐时期的代表人物伟大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还有乔治·弗

里德里希·亨德尔都还没有出生,而被称为音乐神童的18世纪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更是在几十年之后才诞生。只是可惜,中国的古钢琴发展史自康熙帝之后,足足停滞了数百年^[3]。

参考文献

- [1]徐乐.钢琴何时传入我国[J].中小学教育,1988(3).
- [2]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3]白晋.清康熙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M].台北:华明书局,1966.
-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